

名家专栏

储存时间的溶洞

■梁衡

梁衡，《当代贵州》杂志顾问，新闻理论家、散文家、科普作家和政论家。曾任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等职。

贵州号称世界溶洞博物馆，其中最著名的是织金洞，这里有各种造型的钟乳石，千奇百怪，美不胜收。本是要作一次浪漫的赏美之旅，但走着走着倒陷入了对时间的沉思。

时间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了？这是哲学家、物理学家考虑的问题。它实在是太浩瀚虚幻了，让人难以捉摸，甚至从来不去想它。古人发现四季轮回，就把它叫作“年”；又发现月亮缺而又圆，就把它叫做“月”；日升又落，就把它叫做“日”。为了更实用一些，就借助太阳影子的移动发明了计时的“日晷”，借助容器滴水发明了计时的“滴漏”，即古诗里说的“漏声迢递”。再往后有了钟表。但所有这些你眼睁睁看到的正在走着的时间，那么过去的时间去了哪里？能让我们摸一摸，看一看吗。

原来它藏在地下的溶洞里。织金洞已探明的已有12公里长，上下4层，47个大厅，最高者150米，有50层楼房那么高。都说水滴石穿，看看大自然有多么大的耐心啊，能穿出这么大的一个石洞。水穿刷成洞后还不算完，它还要在洞里造石笋、石柱、石崖、石山。当年穿洞是用减法，洗去石头上的钙质；现在造石是用加法，水滴石上，留下一层薄薄的钙质，层层相加，要数万年才长几毫米。而现在眼前的钟乳石如山如峦，这要滴答多少年啊。有一根石柱只有合抱之粗，却有百米之高，一直顶到溶洞的天花板。这要是林中的一棵树，我们会去测算它的年轮，而现在只能推想它的“年层”，那是多么多么薄、肉眼无法看到、显微镜无法捕捉、只能靠理论推算的“年层”啊。在没有钟表之前古人曾点香计时，它就是未有人

类之前造物者留在这里的一柱香，慢慢地燃去水分，留下不去的香灰，留给将要出现的人类。可以想见这项工程的难度：要千万年间洞顶上的那个滴水点与地面垂直不变，石柱才不会歪斜；要千万年间头上的水量匀速下滴，石柱才粗细均匀；要千万年间没有地震等地壳变动，石柱才不会断裂……这是一场多么耗时、耗心又多么精准的实验啊。当年卢瑟夫研究原子结构，八千次的实验才成功一次。想造物者在这漆黑的大溶洞里默默地用功，其耐心更在八千倍之上。神乎其技，伟哉自然！

我在溶洞里徜徉，讲解员在耳边说着些钟乳石的美丽，什么倒挂琵琶，什么霸王的美甲，我全然没有听进去，只想在地球上还没有树木之前怎么就像树一样地长起这些石柱。这时路过一根石笋，只有齐腰之高，因为在路边，被游人摸得溜光。讲解员说这个石笋已有40万年。小学学历史时就记住了40万年前才有了北京猿人。石笋一节，从猿到人啊！想1000多年前温庭筠在月光下从容地咏着他的词“柳丝长，春雨细，花外漏声迢递”，而地球却早已在自己的漏声中不紧不慢地走了过去。

朱自清在他的散文《匆匆》里感叹时间的流逝，“是有人偷了他们罢，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罢，现在又到了哪里？”原来他们跑到地下，跑到了这个溶洞里。按照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空间可以弯曲，时间可以追回。那么时间也是一种矿藏。我这水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不禁觉得自己也被卷进了这个溶洞。

古人说一寸光阴一寸金，难怪这个洞名叫织金洞呢。

全民族抗战中流砥柱的贵州记忆

■丁凤鸣

丁凤鸣，贵州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成员、秘书长，贵州省红色文化重点建设工程学术委员会委员。曾任省委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处处长、省文化和旅游厅文物保护与考古处(革命文物处)处长，长期从事党史研究、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和红色旅游促进工作。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国文物报》《贵州社会科学》《贵州日报》等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主编、参编著作十余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14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人中的贵州儿女，用初心和使命镌刻下全民族抗战中流砥柱的贵州记忆。

中国共产党勇担抗战先锋，黔籍党员积极响应。1931年9月20日，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就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后来成为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任书记的林青，当时正在上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后因参与反对日寇侵略的上海工人总罢工，被英租界巡捕房逮捕入狱。1932年4月，成立不到半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发布《对日战争宣言》。后来成为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贵州籍党员王若飞当时正身陷囹圄，他1933年在狱中给傅作义写下长信，表示坚决抗战，提出持久抗战、全民族抗战以及开展游击战等可贵的想法，彰显出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1936年初，红二、红六军团长征转战贵州，以中共毕节地下党组织掌握的武装力量为基础，组建了“贵州抗日救国军”北上抗日。

中国共产党维护团结抗战大局，黔籍党员坚持斗争。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形成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战的大局。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共贵州省委重建，成立八路军贵阳交通站，设立新华日报贵阳分馆处，全省抗日救亡运动全面高涨。但国

民党顽固派多次制造摩擦，1941年初发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这一时期，省工委负责人黄大陆、李策、肖次瞻先后被秘密杀害于贵阳市府前街保安处防空洞内，全省被捕党员和革命群众281人、被杀害63人。共产党员陈法斌临刑前遗诗：“磊落生平事，临行无点愁……多情惟此月，再照雄心酬”。正是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面对同室操戈，各地共产党员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继续开展抗日活动，维护团结抗战大局，凝聚全省人民坚持抗战的磅礴力量。

中国共产党战斗在抗战最前线，黔籍党员不惧牺牲。共产党人浴血战场，其中有临死不屈的刘仁，不甘受辱的陈淑蓉，深入虎穴的罗会廉，掩护突围的文子全，骑兵勇士杨经国，战地记者胡畏、肖炳焜等一批批优秀的贵州儿女，用生命书写了永载史册的感人故事。比如1943年，八路军120师359旅718团参谋长刘仁，在激战中身负重伤、不幸被捕，但他毫不畏惧、临死不屈，怒视日寇刺刀逼问，最后被残忍地活埋；同年，冀东军区13分区卫生处文化教员陈淑蓉，遭日寇伏击、不幸被捕，怀有身孕的她在途中乘敌不备纵身跳崖，但未能如愿，复被抓住，虽遭严刑拷打，始终没有供出大部队转移方向和后勤物资藏放地点，最后被残忍杀害……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中的贵州儿女们，始终紧跟党走、不惧牺牲，是我们今天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伟大斗争的光辉榜样。

教诲如春风 师恩深似海

乙巳冬月 谭明漆书

《师恩颂》

■安顺市实验学校八(12)班 谭明漆 书
指导老师：王曦



《中华盛世》(剪纸)

■凤冈县中等职业学校 杨嘉欣
指导老师：杨正祥

播州，何以叫“播州”

■周必素

周必素，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博研究馆员。一直从事文物保护及播州杨氏土司历史、考古研究。有《播州杨氏世系考》《播州杨氏土司墓葬研究》《贵州遵义的宋代石室墓》等相关成果。

播州，为什么叫“播州”？作为著名诗人的杨素，为什么会出现播州与番禺的笔误呢？从14首《赠薛播州诗》探寻答案。

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复置郎州，更名曰播州。为什么叫“播州”？目前所见的一种解释是“播，是外国或外族的意思”，故“播，为番之有才者，播州即招抚蛮夷所置之州。”窃以为，有一定道理，但不尽然。

“播”是形声字，从手，番声。“播”的“扌”是意符，“番”是声符。“番”有两读，一读pān，用作地名，如广州番禺；而在中国古代，“番”是指外国或外族，如“土番”“番邦”等，读作fān。而“藩”，也是由此衍生的字，意指封建王朝的属国或属地，借指边防重镇，有藩属、藩国、藩镇、藩邦、藩王等词汇。“播”在古书中通“藩”，这见于郑玄注：“播读曰藩”，如《尚书大传·洪范五行传》即有“播国率相行祀”的记载。如此推测，将位于中国西南边陲腹地地区所建之州定名为“播州”，凸显出的是其位于中国西南边防要津的重要位置和播州之民系西南蛮夷的事实。那么，此“播州”，按古音，应读作“fān zhōu”。

关于播州的始建时间，有两说。一是见于文献记载，即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将郎州更名曰播州，这是播州建置见于文献的最早记载。另一说见于明朝曹学佺撰《蜀中广记·卷二十·名胜记二十·遵义道·遵义府·遵义县附郭》篇，曹学佺根据隋杨素所著14首《赠薛播州诗》即杨素为与他同时代且交情深厚的薛道衡所著的《赠薛播州诗》推测，“疑在隋炀帝之世”即隋代就很可能有“播州”建置了。

但后说其实已经被否定。在邓魁英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第3卷)(隋唐五代部分)》和曹道衡、刘跃进所著《南北朝文

学编年史》中，已经明晰《赠薛播州诗》应为《赠薛番禺诗》，“播州”乃“番禺”之误。因为据《隋书·薛道衡传》：“隋炀帝即位，(薛道衡)转番禺州刺史。”故“播州”当作“番禺”。番禺，隋改广州置。而贵州遵义之古播州，是在杨、薛二位死后30多年的贞观十三年(639年)才出现的建置。

杨素(544—606年)，字处道，弘农华阴(今属陕西)人，隋朝权臣、诗人和杰出的军事家。杨素是隋王朝的开国元勋，也是隋炀帝被立为太子并得以登基的功臣，但隋炀帝是暴君且多猜忌，杨素不得隋炀帝信任，于隋炀帝即位后两年去世。薛道衡(540—609年)，字玄卿，河东郡汾阴县(今山西万荣)人，隋朝大臣，是隋朝艺术成就最高的诗人。因在京主管机密之事太久，隋文帝开皇十九年(599年)，被外遣出京任检校襄州总管。隋文帝仁寿四年(604年)，隋炀帝即位后，薛道衡转任番禺州刺史，被调到了岭南。薛道衡写了一篇歌颂隋文帝的《高祖文皇帝颂》上奏，激怒了隋炀帝，被迫自尽，时年70岁。二位年龄相当、志趣相投，共事于朝廷，情谊深厚。

据《隋书·卷四十八·列传第十三·杨素传》：素尝以五言诗七百余赠番禺州刺史薛道衡，词气宏拔，风韵秀上，亦为一时盛作。未几而卒，道衡叹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岂若是乎！”杨素14首《赠薛播州诗》即开始作于薛道衡任番禺州刺史之时，即仁寿四年(604年)，全部完成于杨素临死前不久，即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之前。这14首《赠薛播州诗》，表达了杨素与薛道衡的深厚友谊和对晚年相同际遇的慨叹。

那么，作为著名诗人，为什么会出现播州与番禺的笔误呢？据上文推测，播、番同音，番禺又位于岭南的今广州，地处南越之地，写成“播”，也在情理之中。

话说牂牁

■范同寿

范同寿，贵州贵阳人。历史学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任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贵州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出版有《贵州简史》《贵州历史笔记》等著作10余部。

据。大体情况是：今德江、正安以北是古巴国的南境；绥阳、遵义、桐梓一带属于黔国；习水、遵阳、桐梓一带属于黔国；赤水、仁怀一带为蜀国的南境。而乌江以南，盘江以东，今从江以西，云南曲靖以东的广大地区，统统在牂牁国境内。当时的贵州高原，黔国和蜀国都很大，几乎占了一半的地区，因此，学者们认为完全可以用牂牁来代表春秋时期的贵州。

究竟距今2500年前的春秋时代有没有一个牂牁国呢？要弄清这个问题，不得不讨论一下《管子》这本书。牂牁一词最早出现在《管子》中。《管子·小匡》篇有这样一段文字：“葵秋之会，天子使大夫宰孔聘于桓公……桓公曰：余乘车之会三，兵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南至夷、越、巴、牂牁……莫违寡人之命。”这段文字至少可以说明两点：一是牂牁国与吴、越、巴并列，无疑是当时的方国之一；二是吴、越、巴都是南夷地区的国家，牂牁国与巴国列在一起，显然是它的近邻。

“牂”是一种祭肉，齐桓公受天子聘的记载，其他文献里也有。《左传·僖九年》就有“王使宰孔赐齐侯胙”，齐桓公拜受胙的内容。至于牂牁的方位，司马迁的《史记》记录得更加明白：郎中将唐蒙在南越吃到狗脊，觉得不错，追问来源。南越人答称：“道西北牂牁江，牂牁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番禺即今广州，广州的西北面正是贵州，由此看来，牂牁国无论作为国名也好，地名也好，它的位置都只能在贵州境内。

一些学者对此持不同看法，他们认为，《管子》一书虽然假托管仲之名，实际不是管仲的作

品，不尽可信，故不能用它来证明牂牁国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存在。《管子》这部书的确不是管仲本人的作品，而是战国和战国之后一批零碎著作的总集。汉代刘向将它编订为86篇，后世保存下来的只有76篇。尽管如此，《管子》这部古文献的历史价值，仍然是不应该轻易忽视的。

出身于商人的管仲是中国古代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在担任齐国卿相时，不仅在经济、政治方面有很多革新，使齐国走上了富强之路，帮助齐桓公坐上了春秋霸主的交椅，还是第一个主张按职业不同，将读书人、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四民”划开聚居，便于子弟进行家庭教育的人。古籍中记述的管子这个主张，是中国最早有关家庭教育的文字记载。

不少学者认为，《管子》既是法家学派一部阐述战争的重要书籍，又有着非常丰富的管理思想。《管子》中包含的军事思想反映了齐国法家学派对战争理论问题的认识，在战争观、治军理论、国家防务、作战指导思想方面，有许多精辟的论述。《管子》中体现的辩证法思想在管理中的运用，甚至使其具有现代价值。有学者进而认为，对《管子》辩证管理思想的挖掘，应该能为当代管理哲学的发展和我们的组织管理提供有益的借鉴。如果仅仅以《管子》并非管仲本人所作而过分贬低这部著作，会不会陷入只见人不见书的偏执呢？

《管子》中涉及到牂牁的主要是《小匡》篇。一些学者在文章中提出，《小匡》篇系西汉人所作，因而书中关于牂牁的记载只是一种后人的追述，可信度值得怀疑。其实，《小匡》篇记述的主要是管仲相齐的历史事迹，起自齐桓公返回齐国恢复统治，终至

霸业完成以后。《小匡》篇的内容与《国语·齐语》大同小异。两者比较，《国语·齐语》的用词和用语比较艰深古朴，《管子·小匡》则比较浅明易懂。叙事方面《齐语》简单概括，《小匡》却比较周严细致。应该说，《小匡》因为有了《齐语》作基础，史实的考订和叙事的准确只会更加严密。至于有人说，西汉人著书就一定为汉王朝对外拓展张目，那只能是一种推测，是不能够作立论依据的。

兴于春秋，灭亡于战国的牂牁国，是贵州历史上的悬案之一。历经几代学人的探讨，现在它的面目开始变得有些清晰起来。眼下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牂牁是春秋时期南方一个较大的古国，范围大致包括今贵州乌江以南及广西的一些地区。当时，因“与中原隔绝，处周邦之外”，牂牁国的名称与黔、桂交界处的牂牁江(即今盘江)，有密切的因果互动关系。在牂牁国与牂牁江的关系上，应先有牂牁江，其后当地土著民族建立方国，因江得名，故称为牂牁国。

借助中原战乱不休的形势，牂牁国不断向四周拓展势力，逐渐强盛起来，一度据自西北到东南近二千余里的辽阔地区，成为名副其实雄霸一方的大国。以至齐桓公称霸时，能与南方诸国并肩参与中原事务。由于牂牁国势力的增强，牂牁江名称的内延也因之向南扩展，成了直抵南海的那条滔滔大河的统称。

春秋之后，牂牁国力衰微，被南越和新兴的夜郎割裂其地，失势的牂牁国君被降削到夜郎旁小邑居住。此后，作为方国的牂牁便不复存在。

牂牁国存在的时间虽然只有百余年，但它却是贵州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阶段。